

专稿

社会科学中的国际问题研究： 关于方法论的断想

张宇燕*

长期以来，学者对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不计其数，著述汗牛充栋，对其进行系统梳理与分析批判，绝非一篇文章所能完成，更是我等非专业人员能力所不及。与此同时，在 40 多年的学习与研究以及教学生涯中，我又深感方法论在研究过程中扮演的不可替代的角色。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前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我开设并连续 25 年讲授了“国际政治经济学”课程，其中涉及研究方法的部分始终都有并且分量持续增加。在此，借《世界经济年鉴》编辑部邀请这一契机，我把多年来读到的方法论有关问题和一些不成体系的思考做些简单的梳理与小结。哪怕只有为数不多的年轻读者能够从中获益，我便心满意足了。特别强调一句，本文绝非关于科学方法论的研究论文，而是一篇个人阅读的文录与思考。鉴于全文没有统一完整的分析架构，而且许多段落都来自多年来的读书笔记，我特将文章定名为“关于方法论的断想”。

研究对象：作为一个复杂系统的政治经济

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涉及人们的分工、合作、冲突以及保障分工与合作和处理冲突的制度安排。复杂的系统是可以被严格定义的。社会科学关注的行为人是异质性的，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各有特点，同时行为人之间相互且直接发生作用。每个行为人在做出行动选择时必须以所掌握的信息为基础，而他们所拥有的信息又都是不完备的或局部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通常依靠简单的“拇指原则”来进行选择。所谓“拇指原则”，简单来说就是依据经验做出决策。尤为重要，对个人行为的简单叠加推导不出社会的总体行为。换句话说，总体行为只能产生于个人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但又无法通过对系统组成部分的分析来全面理解系统。复杂系统同时还涉及突发特性，并在路径依赖的过程中形成，且系统中的个人一直在优化自身的行为。复杂系统的微观基础是情境化的，只能参考现有系统及其历史方能理解。^①

特别需要浓墨重彩地指出的一点是，人的异质性也是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与物理学或化学等自然科学的本质差异所在。如果没有列宁的钢铁般的意志，十月革命很可能就不

* 张宇燕：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和世界经济，yyzhang@cass.org.cn。

① 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编（1987）：《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复杂系统”条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翻译编辑委员会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会发生或以其他形式发生。^①

如果按人们相互作用的维度来划分,社会科学所研究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系统,可以大致分成六类:一是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二是个人和群体(如企业或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三是群体和群体之间的关系;四是个人或群体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五是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六是民族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即国际关系)。显然,这只是一种粗略的划分。以国际关系为例,巨型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动体的影响力不容小觑。不过,考虑到国家行动体与非国家行动体相比具有代表性,我们姑且在此挑选国家间关系作为层次划分的标识。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定社会中的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即生产关系。马克思特别强调,商品、资本、货币本质上都是生产关系,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其中最为根本的是所有制关系,即个人在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方面的相互关系。研究生产关系必须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因为分工^②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③点明并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物为中介,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我们对于复杂系统的理解。显而易见的是,在当今时代,尽管有争议,但“物”的含义也需与时俱进,亦即像数据和科技以及种类繁多的“服务”应该被包含进去。顺便说一句,马克思在此所说的分工深入与细化和所有制形式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挖掘的理论“金矿”。^④

国际问题研究的三大理论分支

随着人类进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国际及全球问题的重要性急剧上升,国际问题研究已成为显学。从传统角度看,对国际关系和全球问题进行研究的理论,主要有如下三个分支: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

尽管国际关系学和国际政治学两者不完全相同,但大致可以将其归为一大类,因为其研究范式及方法与政治学一脉相承。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子集,国际关系学(以及国际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国家间的多维关系,其中主要是国家间的政治外交关系,特别是安全关系,以及国内政治及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鉴于国家间关系的多维性,国际关系学就学科性质而言属于交叉学科或跨学科。国际经济关系无疑是构成国际关系的组成部分,但其分量或权重,远不及被称为“高政治”的安全,而只能屈居为“低政治”。就研究方法而言,至少在当今

① 丹尼尔·贝尔(1980):《当代西方社会科学》,范岱年、裘辉、彭家礼、易克信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② 托马斯·霍布斯(1642):《论公民》(献辞),应星、冯克利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③ 马克思(1859):《〈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1846):《德意志意识形态》,分别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和第2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马克思(1867):《资本论》,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④ 话说至此,一个想法悄悄地冒了出来:有没有一句话能够把社会科学研究,也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概括出来?在阅读中我注意到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讲过的一句话:“一个人怎么会声称某物归他自己而非别人所有?”〔参见霍布斯(1642):《论公民》(献辞),应星、冯克利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换言之,“你凭什么说那东西是你的?”我们每个人都有手机,但哪个零件是我造的?没有。哪个软件开发和我有关?没有。但如果有人偷走了或抢走了我的手机,警察就要把他抓起来并追究他的责任。为什么?如果能够把这件事情的内在机理和相关产权制度讲清楚了,大概也就把人和人之间的基本关系讲清楚了。

中国,学者们主要采取的还是政治学和历史学方法。不过海外的国际关系学者和新一代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则越来越注重将数理和计量方法运用于分析之中,比如博弈论等。

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国际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国家间经济关系。其大量应用了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其研究可分为理论性部分和描述性部分,前者可以进一步分为国际贸易的纯理论和国际货币经济学。^① 具体而言,国际经济学涉及的是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而国家不同于地区、家庭、厂商和个人。国家拥有主权,这意味着没有一个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全球警察而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各个国家。拥有主权的国家可以在其成员实体与其他国家之间树立起各种各样的壁垒,它们可以更为关心本国而不是他国的利益。^② 这种“国际性”决定了国际经济学研究的问题从国内扩展到了国家之间,包括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贸易政策的选择、汇率与外汇政策、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要素流动等。

一般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两大历史事件成了它的“助产士”: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石油禁运。随着经济因素在国家间关系中地位迅速上升,国际关系学者主动或被动地开始关注国际经济问题,但使用的方法却主要是政治学和历史学的。他们通常以跨国关系为起点,探讨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并强调了相互依存导致的经济利益和政治代价之间的相互关系。^③ 还有学者把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视为理解和把握当代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变化的基础,注重世界市场经济对国家关系的影响以及国家为自身利益需要而影响市场力量的方式。^④ “无论是强调市场还是强调国家的角色,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不能将这两者都考虑周全,任何一种现象都无法得到充分的解析。……人们必须将权力和相互依存放在一起进行分析”。^⑤

从一定意义上讲,国际经济政治学可谓上述三个国际问题研究“流派”的混合体。就研究对象而言,国际经济政治学关注的同样是国家间关系,在这一点上与国际经济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其研究对象不仅是经贸和货币金融关系,而且还将安全甚至战争以及全球问题等纳入自身的研究范畴。就研究方法而言,国际经济政治学与国际经济学较为接近,更青睐经济学,所使用的概念和分析框架主要来自经济学,特别是广义的新制度经济学^⑥以及博弈论。就学科目标而言,国际经济政治学从国家人格化出发,把国家看作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主体,分析国家之间的暴力(战争)关系和非暴力(经济制裁)关系等,力求为国际关系研究给出一套以经济学为基础的演绎逻辑。与此同时,国际经济政治学还力求为诡谲的国际关系提供一些经济学的解释或可供检验的理论假说与重要命题,并且努力为国际关系演化找到某种尽可能坚实的“国内基础”。今天的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内外政策及其对国际格局的影响,便是一个极佳的研究国际经济政治学的切入点。

① G. 甘道尔夫(1980):《国际经济学I:国际贸易的纯理论》(第2版修订版),王小明、刘洪钟、杨建宇、姚勇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1页。

② 托马斯·A. 普格尔、彼得·H. 林德特(1999):《国际经济学》(第11版),李克宁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③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2001):《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④ 罗伯特·吉尔平(1987):《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⑤ 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莱斯勒(2002):“IPE的发展历程”,《世界经济与政治》,第1期,第8页。

⑥ 在约翰·N·德勒巴克、约翰·V·C·奈(1997)主编的《新制度经济学前沿》(张宇燕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序言中,编者把企业理论、产权理论、法律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新经济史理论等,均视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组成部分。



作为社会科学之基石的历史

讨论方法论，有一个问题绕不过去，那就是如何看待历史和如何运用历史。对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历史感属于必备素质。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把握国际形势必须树立正确的三观时，首先提到的便是历史观，指出我们“不仅要看到现在国际形势什么样，而且要端起历史的望远镜回顾过去、总结历史规律，展望未来、把握历史前进大势。”^① 历史的重要性首先表现在阅读思考历史，这有助于我们认识人类社会这一复杂系统，能够帮助我们增进对人性的理解。我们从事的国际问题研究，看上去是讨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说到底都是在和人打交道，底层逻辑根植于对人性的认知，尤其是对特定国家的民族性的理解与把握。许多东西变化很快，今天的手机和10年前或20年前的手机已经不可同日而语。10年以后我们还用不用手机？那时我们大概率不再用手机了，代之以人工智能的穿戴设备。然而人性却是不变的。

这里我想特别提一下经济学大家熊彼特对历史的态度。^② 他写道，如果在经济史、统计和理论三者中做出唯一的选择，他选经济史，理由如下：第一，经济学的内容实际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者所谓的历史经验，就不可能指望他理解任何时代的经济现象。第二，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第三，时下的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都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至于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虽说熊彼特在此谈的是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但这段话的适用范围是比较广的。

阅读思考历史需要哲学，或者说历史需要不断升维。重量级的历史哲学家中，喊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就是一位。在他看来，和当代史一样，“非当代史”或“过去史”的存在条件是，它所述的事迹必须在历史学家的心灵中回荡；那些被称为“非当代史”的历史也是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研究过去的事实，过去的事实和现在的生活兴趣打成一片；（历史的）真实性永远需要内在的理由。^③ 和克罗齐同样引起巨大争议的是英国哲学家柯林武德，后者提出的“口号”在形式上与克罗齐的如出一辙：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在柯林武德眼中，历史并非单纯的事件或行为记录，其根本对象是隐藏在它们背后的人类思想活动，如行为动机与意图，以及战略构想。鉴于事实的不完备性和不可能回到从前，历史学家只能或必须用有限事实和逻辑及想象去把支离破碎的历史之网编织成形。他还特别强调说，成为一名优秀历史学家的关键不在于知道多少，而

① 习近平：“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载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27页。另外“两观”为大局观和角色观。

② 约瑟夫·熊彼特（1954）：《经济分析史》（第二章“经济分析的技术”，此章是第一卷中的内容），朱泂、孙鸿敞、李宏、陈锡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熊彼特在强调历史重要性的同时，也以经济学家的视角犀利地点明了历史学家的短板。他曾写道：“历史学家没有告诉我们多少有关经济学原理的知识。即使最优秀的历史学家在谈到普遍原理时也会大打折扣。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判断个体事件上极具智慧，但是一谈到普遍的因果关系时则无能为力，尽管他几乎不讨论具体的经济问题。演说家的讲稿，剧作家的剧本也仅仅是写一些大众化的观点。”参见约瑟夫·熊彼特（1912）：《经济学说与方法史论》，武黄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3页。

③ 贝奈戴托·克罗齐（1946）：《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6页。

在于能否提出有价值的问题。^① 应该讲克罗齐和柯林武德的全称判断式历史哲学主张多少带有偏颇意味，但它们均迫使或诱使读者进一步去思考：何为事实？何谓历史？历史意义何在？

由此引出的问题涉及历史批判，或曰识别历史的迷雾与误导。甚至有敌视历史学的人声称大部分历史是猜的，剩下的都是偏见。^② 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属于从学理上质疑“历史有意义”的代表。在他看来，每个历史学家在书写的时候都有他的局限性，不仅表现为知识有限或信息局部，更表现为他们都有自己的价值理念甚至个人诉求乃至恐惧担忧。由此，波普对“历史有意义吗”这一问题的回答简单明确：历史没有意义。^③

历史沉思的另一类风险，在哲学家罗素眼中来自过分肯定历史必然性，因为发现历史中因果关系的可能性只存在于相当有限的范围内，历史中的重复现象远不像天文学中那么多，历史中的规律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重要，或那么容易被发现。任何历史学家，不管他多么有学问，都无法在 14 世纪预言哥伦布和达·伽马所带来的变化。^④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物理学中的一个假说：“各态历经”，即任何状态永远不再发生的概率为零。^⑤ 一个各态历经随机过程仅仅意味着根据过去观察计算的平均数不会持续地不同于未来结果的时间平均数。经济学家诺思特别指出，各态历经的经济是一种基本经济结构恒定不变的经济。从新石器革命以来的一万年，人类历史的各态历经假说是反历史的。社会各种超常变化普遍存在。我们一直并正在创造的社会与过去任何社会相比都是独一无二的。^⑥

对此我的评论是，无论历史还是历史研究都非完美无缺，在阅读和思考时我们需要对历史保持一定的警惕，牢记“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这句箴言。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历史乃一切社会科学之基础，发挥着社会科学建设的“基础设施”之功能，而且历史演化是有一定的规律性的，历史规律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认识的，违背历史规律是会受到惩罚的。钱穆先生下面的话，至少从实用的层面上看，真切地昭示了历史之意义：在现实中发现问题，到历史中寻找答案。^⑦

思想史的价值

历史博大精深，思想史便是总体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且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部

① R. G. 柯林武德 (1946):《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年版。在其自传 (1939) 里，他特别谈到一个朦胧的想法如何经过 9 年才被精炼成掷地有声的“金句”：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参见柯林武德：《柯林武德自传》，陈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② 威尔·杜兰特 (2002):《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王琴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4 年版。

③ 卡尔·波普尔 (1945):《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郑一明、李惠斌、陆俊、黄书进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④ 罗素 (1954):“历史作为一种艺术”，载于《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张文杰等编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年版。

⑤ 各态历经假说 (ergodic hypothesis) 是由 L. 玻耳兹曼于 1871 年提出的假说 (ergodic 一词源于希腊语，意为“由功和路径”组成)，旨在将统计规律性还原为力学规律性。其核心观点认为，孤立系统从任一初态出发，经过足够长时间后将经历所有可能的微观状态。但后续研究表明，代表点的轨迹无法覆盖能量曲面所有点，原始假说被证明不成立。20 世纪初，P. 厄任费斯脱夫妇提出准各态历经假说，将“历经”修正为“无限接近”。经 G. 伯克霍夫、E. 费密和冯·诺伊曼等人研究后，各态历经假说被证实无法作为统计物理基础，最终微正则系综基于等概率原理成为基本统计假设。

⑥ 道格拉斯·诺思 (2005):《理解经济变迁过程》(第二章)，钟正生、邢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⑦ 钱穆 (1952):《中国历史精神》，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钱穆的原话为：“研究历史，应该从‘现时代中找问题’，应该在‘过去时代中找答案’，这是研究历史两要点”，参见该书第 16 页。



分。对社会科学某一特定学科的研究者来说,了解自己研究领域的思想史必不可少。关于这一点,我对汪丁丁教授所述观点可谓感同身受。他写道,在人类知识的版图上,不熟悉全貌的人很难对问题的重要性有所感受,而教育的核心价值之一就是熏陶学生们对重要问题的敏感性。而这种问题敏感性的获得和逐渐强化,则来自对所专注学科之思想史的学习与领悟。任何学问的正确开端是且仅是这一学问的思想史。^①

具体到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在考德威尔看来有七种价值。首先,经济思想史涉及原始故事。从教科书中学习经济学而没有从思想史中受益的学生,不会意识到思想史的发展总是伴随着论证、思辨和批评。其次,在学习经济思想史的过程中,通过阅读原始文本和相关文献,我们可以与这门学科中那些伟大的头脑展开对话,讨论重大问题。第三,经济思想史课程非常适合培养所谓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即通过构建有充分支持的论据,有效且有说服力地进行写作和演讲。“习题集教学法”的普遍存在,使教师的工作变得更为轻松。这种教学方式是可耻的,一味将其视为最佳做法的现象应当受到谴责。第四,人们会在历史中反复遇到同样的思想关切,尽管它们通常会在新的背景中或新的外表下出现。弗里德曼曾称之为新瓶装旧酒。第五,思想史可以纠正严重的解释错误。第六,经济思想史课堂是经济学课程中仅有的几个能让学生接触到主流之外的观点的地方之一。对历史的无知阻碍了知识的增长与积累。如果一个人具备历史敏感性,他就会意识到,当初做出这种理论选择只是出于偶然。理论并非按照某种好的经济学的永恒标准而发展。事实上,一旦我们对自己学科的历史有了更多认识,一系列全新的问题和见解就会出现。将经济思想史纳入研究生培养的一个好处是:帮助学生认识到经济学中的各个假设。如果你是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或社会学家,你就是这样看待某个问题的。这种专业化有明显的好处,但也有代价。对经济学家来说,研究思想史至少可以提供部分补救措施。学习经济思想史课程很像旅行,正如旅行使人意识到自己的文化偏见一样。学习经济思想史有助于使人意识到自己的学科偏见。最后,学习经济思想史能让我们意识到当下可能并非一切知识的顶峰,从而变得更加谦逊。在我们学科的历史中,充斥着曾一度占据主导地位的主流思想学派最终消失在历史中的例子。比如,18世纪法国重农主义者在欧洲被认为是当时一流的经济学家。在哈耶克眼中,科学主义信条披着科学的外衣,但实际上是不科学的。经济学是这样一门科学,它永远最多只能做出一些宽泛的预测,或是对现象背后的原理作出解释。^②

科学哲学与科学的分类

科学哲学与主要的科学理论是一致的,在某种意义上它立足于重要科学理论的世界观的表述。科学哲学试图解释的是科学家对研究方法的偏好和对自然的假定,是分析和澄清科学的概念和理论的一门学科,研究的主题是各门科学的程序与结构,力求回答的主要问题包括:一是哪些特征把科学研究与其他类型的研究区分开来;二是科学家在研究自然时应遵循哪些程序;三是正确的科学解释必须满足哪些条件;四是科学定律和原理的认识论地位。^③

谈论科学研究方法论不谈康德就像谈论经济学不提斯密、马克思和凯恩斯。康德对知识

① 汪丁丁(2019):《思想史基本问题》(自序),北京:东方出版社2019年版。

② 布鲁斯·考德威尔(1982):“实证主义与经济思想史”,李黎力、熊多多译,《经济思想史学刊》,2021年第4期。

③ 亚里士多德被尊崇为第一位科学哲学家,在《分析后篇》他通过分析有关科学解释的某些问题而创立了科学哲学。其巨大成就之一,在于他坚持一个论证的可靠性仅仅由前提和结论的关系来决定。参见约翰·洛西(1980):《科学哲学历史导论》,邱仁宗、金哲伦、林夏水等译。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

或研究做出了集大成和里程碑式的分类。由于这种分类对我们思索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不得不在此尽可能简约地概述之。康德以为，古希腊哲学有三个部分：物理学、伦理学和逻辑学，人们对这种分类只能加以补充，以保证对它们的充分理解。而康德所做的补充性工作，主要体现在他对全部的理性知识的进一步分类，即“形式的”和“质料的”的知识。“形式的”知识只涉及知性的形式，涉及理性自身，涉及思维的普遍规律，而不涉及对象的差别。这种“形式的”哲学被称为逻辑学，其特征就在于没有经验的部分。易言之，思想的普遍必然规律不需要以经验为依据。按照所研究的对象及其所服从的规律，“质料的知识”又可以分为两种：物理学和伦理学。物理学是关于自然规律的学问，而伦理学则是关于自由规律的学问，也就是道德哲学。“质料的知识”或质料哲学所包含的物理学和伦理学与“形式的”逻辑学完全相反，它们都有自己的经验部分。自然哲学须给作为经验对象的自然界规定自己的规律，道德哲学则须给在自然影响下的人类意志规定自己的规律。自然规律是万物循以产生的规律，道德规律是万物应该循以产生的规律。康德随后把全部以经验为依据的哲学称为经验哲学，把完全以先天原则来制订自己学说的哲学称为纯粹哲学。当单纯是形式的纯粹哲学或逻辑学限制在知性的一定对象时，就称为形而上学。接下来又有了两种形而上学：自然形而上学和道德形而上学。当纯粹哲学或逻辑学限制在物理学和伦理学两个特定对象上时，物理学便既有它的经验部分，也有它的理性或非经验部分；伦理学亦如此，其经验部分被称为“实践人学”，理性部分为“道德学”。^①在此书出版一年以后，康德给出了关于科学的一个非常宽泛的定义：“每一种学问，只要其任务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建立一个完整的知识系统，皆可被称为科学”。^②

一直到19世纪，人们对“科学”的严格定义与标准并没有明确认识。当时的普遍看法是，“只要把一些理论用某种逻辑形式组成一个探讨知识的体系”，就足以被认为是一门科学了。科学在当时就是指“有条理的整体”。^③到19世纪中叶，专门以科学知识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才面世。^④人们有意识地给“科学”下定义并努力给出科学的判定标准，还是20世纪早期随着哲学逻辑实证主义学派的兴起出现的。这一哲学体系不仅提供了评价某种理论和解释的标准，而且提供了衡量所有研究领域成果的标准，其中霍里斯和内尔所归纳的逻辑实证主义准则很有代表性：一，只有通过经验才能证明知识的正确性；二，经验结论可能是完全相反的；三，所有认识上有意义的论述或者是分析性的，或者是综合性的；四，综合性结论如

① 康德（1785）：《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前言），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康德的书晦涩难懂是事实，但逻辑严谨智识深邃也是事实。在此引述的康德对知识或科学研究的分类，我反复读过十多遍，每一次读都能感觉方法论特别是文字推理带来的冲击力。至于书中的核心思想——“定言命令”，则更是如此。顺带提一句，从康德的下述文字中，即“一切手工和技艺都通过分工而取得进步……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工作还没有进行划分，每个人还都是个百事通，那么这个行业就处于落后状态”，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亚当·斯密的身影。把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作比较研究，一定是个妙趣横生的大题目。

② 在康德（1786）的《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中文版中，这句话被译为“每一构成为一体系（即按照原理而排列起来的认识整体）的学说就构成为一门科学”，见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我们在这里使用的译文来自汉斯·波塞尔（2002）：《科学：什么是科学》，李文潮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页。

③ 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主编（1983）：《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苏通、康以同、赖金昌、李敏、孟扬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1页。

④ 例如，费希特1837出版了《科学论》，博尔扎诺发表了《科学论》。参见汉斯·波塞尔（2002）：《科学：什么是科学》，李文潮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后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43年出版了《逻辑体系》，休厄尔1847年出版了《归纳科学的哲学》。参见艾伦·瑞安：“穆勒，约翰·斯图亚特”，载于《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翻译编辑委员会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00-506页。



何，事先并不知道；五，分析性论述没有事实依据；六，分析性真理的正确性取决于惯例；七，因果规律是经过充分证明的经验假设；八，检验一种理论，就要看这种理论的预测能否成功；九，科学中不存在价值判断；十，科学的划分是根据主题，而不是根据方法。^① 后来逻辑实证主义也受到来自不同角度的批评。对此后文会有所提及。

虽然关于“科学”“科学分类”以及标准问题经历了长期的争论，但综合而言，20 世纪 60 年代内格尔下面的一段话讲得还是很得体的：正是要使所做的解释既有系统性又受事实证据的约束这一愿望产生了科学；正是以解释性原则为基础来组织和分类知识构成了这些科学的特殊目标。^② 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理论和科学的研究必须能够从逻辑上经得起推理，并且能够经得起检验。需要注意的是，事实检验并非一定是证实，关键在于具有“可检验性”；^③ 检验也未必一定要进行，有时候理论上可检验就可以了。

按照科学哲学家们的看法，科学语言是有层次的。最高层次的是理论，即通过把定律归并到一个演绎系统中来解释定律，其中定理就是用逻辑方法判断为正确并作为推理依据的真命题，是定律的演绎系统，如分子运动理论；其次是定律，指科学概念之间不变的或统计的关系，如欧姆定律或波尔定律；第三是概念或概念的，包括那些赋予科学概念以数值的陈述，如 $P=0.2$ 个大气压；最后是原始实验数据，比如关于指针的读数、计数器的声响等陈述，如指针 P 在 3.5 上。^④

后来我们陆续见到了一些以“什么是科学”为名的著作，但多数都是通过批判某一类科学思维或方法来阐释某种科学主张。比如，查尔默斯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归纳推理：考虑到样本无穷多，即便收集了巨量的样本，但在数学上取极值后结果还是等于零，并以此宣判归纳方法的死刑。^⑤ 天体物理学家弗兰克、理论物理学家格雷森和哲学家汤普森，则剑指当今科学之重荷“遗忘经验”，强调观察者是实验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贬斥那些认定科学能够获得一种脱离肉身、超越时间、完全客观的实在图景，从而将求知者和被知对象彻底割裂的科学类理念与实践。^⑥

科学的目标

科学研究有目标吗？如果没有，为什么有那么多智慧的大脑为其倾尽一生而无怨无悔？如果有，那又是什么？我之所以关心科学的目标，主要是因为回答这一问题几乎等同于回答如何判定科学研究质量高低的问题。这让我想到了主攻博弈论的数学家罗伯特·奥曼。一

① 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主编（1983）：《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苏通、康以同、赖金昌、李敏、孟扬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2 页。

② 马克·布劳格（1985）：《经济学方法论》，石士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第 1 页。

③ 波普尔专门讨论了证实与证伪，并强调可证伪性对科学进步更为重要。参见卡尔·波普尔（1963）：《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纪树立、周昌忠、蒋弋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 年版。

④ 各层次概念间关系如下：每一层次都是对低一层次的解释；陈述的预见力由底层向顶层增高；科学语言内部的主要区分在观察层次和（后三层）和理论层次（顶层）之间；观察层次包括压力和温度等可观察的事物，理论层次包括夸克等不可观察事物；观察层次的陈述为理论层次的陈述提供检验基础。参见约翰·洛西（1980）：《科学哲学历史导论》，邱仁宗、金哲伦、林夏水等译。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 1982 年版。

⑤ A. F. 查尔默斯（1976）：《科学究竟是什么？》，查汝强、江枫、邱仁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⑥ 亚当·弗兰克、马塞洛·格雷森、埃文·汤普森（2024）：《何为科学》，周程、廖新媛、杨军洁、万舒婵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25 年版。此书英文原名的直译为《盲点：为什么科学不能无视人类经验》。

般认为,科学的目的一是发展那些可实际应用的工具,比这高一级的目的是凭借这些工具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然而这两种观点在奥曼看来都遗漏了问题的关键,因为从最基本的层面上讲,科学活动的目的在于领悟周围的世界,并且一旦我们对世界有所领悟,那么应用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具体而言,奥曼讲的领悟包括三个基本要素^①:第一个是“联系”或“关联”,第二个是“统一”或“适用”,第三个是“简洁”。三者构成了科学研究努力实现的目标。

“联系”或“关联”的含义在于将纷繁复杂世界中或你所关注领域内的主要变量识别出来,并且说明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如果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是稳定的,那么一个表示变量间因果或相关关系的模型便建立起来了,由此我们便可以通过预测来实现我们对周围世界的领悟,至少可以帮助我们检测我们领悟这个世界的准确程度。“统一性”或“适用性”可以被看作是“关联”的特例,也就是涵盖范围或领域。以模型表现的领悟,其适用范围越广,其有效性或实用性就越强。典型的例子当首推进化论和万有引力定律。我曾经问过我的导师奥尔森,他说他心目中最伟大的科学家是达尔文,理由就在于达尔文进化论的辐射力强大,不但能解释整个生物界的进化,而且还能够解释很多人类社会现象。至少在这一点上,奥曼和奥尔森可谓“英雄所见略同”。至于“简洁”,其内涵之一是用尽可能少的外生参数来解释特定现象。托勒密的本轮理论可能是正确的,但它需要很多外生参数,而牛顿的定理仅需要两个参数。比拼的结果是牛顿的理论取代了托勒密的理论。“简洁”的另一内涵是理论结构的简约。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理论越简单就越有用,进而越有效。

既然说到了科学及科学研究,这里也就顺便谈一下技术。对技术讨论不少,但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的思考可谓真知灼见,^②并且几乎完全可作为科学研究过程中的操作系统。阿瑟指出,技术是被捕捉到并加以利用的现象集合。本质上讲,技术是指向某种目的的、被编程了的现象。编程在此强调的是使技术成为技术的现象,是以一种有计划的方式组织起来的。现象中的大多数都是相当基础的物理现象(如燃烧系统和涡轮系统),它们被捕获后被封存在各种装置中且反复使用。现象乃技术的基因。每项技术是通过一组现象以不同方式进行编程后被创造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现象、新基因会不断加入进来,它们先是被捕捉并表达为技术元素,然后被组合。技术的进化机制就是组合进化。当一个领域的关键技术发生根本性改变时往往会引发变革。一旦元素数目突破一定阈值,组合机会便可能爆炸式增长。故新技术无非是指在概念当中或实际形态当中将特定需求与可开发现象链接起来的过程。一项新技术会引起经济中产品价格和生产网络在各行业伸展与重塑,同时经济也通过投资和市场选择等影响技术。技术与经济的共变和共创过程引致“颠覆性改变”。

值得一提的是,在经济学中还有一个专门的分支叫作“科学经济学”。现代科学经济学旨在理解科学对技术进步的影响,解释科学家的行为,评判科研机构有效或无效。具体说,它主要由三个“问题领域”组成:其一主要讨论科学进步如何推进技术进步并带来生产力与经济的增长;其二与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有交叉之处,着力解决科学如何发展的问题;其三是关于科学家的供求、报酬和生产力的实证数据采集和经济计量分析。^③

^① Aumann, R. (1985). What is game theory trying to accomplish? In *Frontiers of Economics*, edited by Arrow, K., & Hanks, 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② 布莱恩·阿瑟(2009):《技术的本质》,曹东溟、王健译。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23年版,第53-57、121、194页。除了对技术本质的研究外,他还是收益递增理论和复杂经济学的创立者之一。

^③ 小阿瑟·M·戴蒙德:“科学经济学”,载于史蒂文·N·杜尔劳夫、劳伦斯·E·布鲁姆主编(2008):《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二版第六卷),贾拥民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91-296页。

科学发现与进步的逻辑

提及科学进步或科学革命，就绕不过库恩这个名字。库恩最初是一位物理学家，故其科学革命思想主要是针对自然科学提出的。正常情况下，科学问题会在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范式”（paradigm）框架中得到解决，而库恩将“范式”定义为特定共同体成员共享的一系列信念、价值观和技术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问题开始变得无法在给定的范式中得到解答。当这种情况变得愈加明显时，危机便出现了。当危机严重到一定程度时，危机本身便可能为新的范式的出现铺平道路。如果危机足够严重，且没有其他范式对现存范式无法回答的问题给出解答，新范式就可能被接受，并且取代旧范式。由此，以科学的范式转换为标志的科学革命就发生了。革命并不一定总是意味着进步，更不意味着在每个方面都取得进步。在科学革命中有失也有得，而科学家似乎对前者视而不见。库恩强调，现有规则的失效，正是寻找新规则的前奏。^①

为了批判库恩的理论，匈牙利数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理论。他写道，一个研究纲领（research programme）包含许多理论和方法论规则。有些规则规定了应避免哪些研究路径（反面启示法），另一些规则规定了要追求哪些研究路径（正面启示法）。所有的研究纲领都以一个“硬核”（hard core）为特征。反面启示法禁止科学家质疑这个硬核。与此同时，科学家们会发展出一系列辅助性假设，从而形成围绕着硬核的“保护带”。由辅助性假设构成的保护带必须承受来自外部的攻击。为了保护硬核，保护带可能会被修改，甚至被替换，在这个过程中，硬核可能会变得更加坚硬。如果一个研究纲领引起了“进步的问题转换”，即该研究纲领使发现及预测新的事实成为可能，那么它就是成功的。这表明科学的发展比库恩的范式转换理论所宣称的“科学革命”更加具有连续性。^②

因为更贴近现实，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很快就受到社会科学家的青睐。比如，雷米尼就将拉卡托斯的理论运用到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中。他指出，主流经济学之研究纲领的“硬核”由以下八个命题组成：一是消费者和生产者可以被合理地假定为理性决策者，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二是经济活动的动机是个体的自利；三是多比少好；四是如果存在完全知识和良好的政府，经济福利将通过自由竞争实现最大化；五是虽然福利与经济福利不是同义词，但后者是对前者的一个很好的近似；六是对于所有与经济研究和分析相关的市场，都可以定义稳定且帕累托有效的均衡解；七是一切事物都有机会成本；八是抽象的简化式模型和简化假设是经济分析的有效工具。^③雷米尼对经济学硬核的总结大体准确，在此提及他的总结一方面为了展示拉卡托斯理论的被接受度，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增进我们对经济学的理解。

库恩和拉卡托斯在谈论科学革命和研究纲领时，虽然总是以自然科学和数学为背景，但是他们的论述与发现，即自然科学的历史比以前认为的要复杂得多：理论选择没有硬性的标准；科学学科会由于各种原因改变其研究重点和做法，这些原因有学科内部的，也有学科外部的，人们需要对其进行研究和解释，等等，于是引起了社会科学从业者的广泛关注。后来，

① T. S. 库恩（1962）：《科学革命的结构》，李宝恒、纪树立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版。

② 伊·拉卡托斯（1978）：《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第一章“证伪与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顺带说一句，拉卡托斯的英年早逝着实令人惋惜。

③ Remenyi, J. V. (1979). Core demi-core interaction: Towards a general theory of disciplinary and subdisciplinary growth.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1 (1), 30-63.

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科学研究专家等拓展了这些科学史家和哲学家的开创性观点。尽管方法不尽相同，但他们都通过对大量科学实践进行细致的研究，证明了科学变革的偶然性和多样性。^① 在一项归纳总结 1900—1965 年间社会科学进步的研究中，多伊奇等人开列出了社会科学理论创新的三条评判标准：一是社会科学的某一理论或一项发现说明了一种对某些关系的新理解；二是给出了具有“如果……那么……”式的可检验命题；三是产生了某种实质性影响从而引发对特定问题的进一步认识。根据上述标准，他们总共认定了 62 项创新成果，其中包括：莫斯卡和帕累托的精英研究，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心理与精神分析，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和熊彼特创新理论，诺依曼和摩根斯坦的博弈论，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表和萨缪尔森等人的计量经济学，列宁和毛泽东的政党及游击战理论，罗素和怀特海的数理逻辑，等等。^②

值得提及的是“方法论无政府主义”，即认为科学本质上是一种“无政府主义”事业，没有普遍的规范性的方法。

归纳推理·演绎推理·溯因推理

关于逻辑推理，特别是归纳和演绎，属于老生常谈，推陈出新不易。本文在此单列一节加以讨论，主因有三：首先是不得不照顾一下全文的结构，毕竟逻辑推理乃方法论的必备元素；其次是打算借题发挥，谈一下对归纳和演绎的批判性思考；最后则是引出溯因推理，一个我本人研究时经常沿袭的方法。

归纳推理指的是从众多事实或经验中得出一个一般性命题，其崇尚理论建构应当基于经验中的规律性，强调理论与事实的一致性，其思想基础为经验乃知识之源。^③ 所谓“从现实中来，到现实中去”“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指导实践”就说明了归纳的重要性。政治学、经济学或社会学的许多理论均来自归纳。物理学或力学中的绝大多数定律或公式更是如此，通过观察或实验，伽利略提出了自由落体公式，欧姆发现了电压、电阻、电流之间的稳定关系，最后形成欧姆定律。至于为什么自由落体的位移公式是 $h = 1/2gt^2$ ，我们无从得知，似乎也没有必要知晓。爱因斯坦信奉“斯宾诺莎的上帝”而非“同人类命运和行为有牵累的上帝”，^④ 理由也在这里。这一点彰显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一个本质区别。

对归纳主义的批评来自不同角度。首先，事实如此之多以至于可能出现如下情况，即想证明什么就能够证明什么。^⑤ 其次，尽管已有的观察结果支持一种理论，但未来的观察结果则未必，比如所谓“黑天鹅”现象。再次，理论与事实的一致性并不能说明它是对未来预测的因果机制的正确表述。复次，以事实为基础的“事实”可能真也可能假，而真实的“事实”并不总是可获得的。最后，对事实的选取和使用与人的主观价值密切相关，事实与观察者之

① 布鲁斯·考德威尔（1982）：“实证主义与经济思想史”，《经济思想史学刊》，李黎力、熊多多译，2021 年第 4 期。

② 丹尼尔·贝尔（1980）：《当代西方社会科学》，范岱年、裘辉、彭家礼、易克信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卡尔·多伊奇等人的研究发表在 1971 年 2 月的《科学》杂志上，题为《有利于社会科学重大进展的条件》。

③ 谢拉·C·道（2001）：《经济学方法论》（第六章），杨培雷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④ 见“我信仰斯宾诺莎的上帝”，载于《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 53 篇）。爱因斯坦写道：“我信仰斯宾诺莎的那个存在事物的有序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而不信仰那个同人类命运和行为有牵累的上帝”。

⑤ 列宁对归纳主义进行过辛辣的批评，他写道：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参见列宁（1916）：《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序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

间不完全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某种互动关系。^①

与归纳不同,演绎是从假定前提出发,经过一系列的推理得出结论。许多经济学家就是在既定的一些假设下,通过推理来构筑理论“大厦”的,其中马克思为最重要的代表。在《资本论》一书中,他写道:“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以此为依据,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中抽象出了基本细胞——商品;随后通过严密娴熟的演绎推理,引申出商品的二重性:价值与使用价值;在此基础上推导出劳动的二重性: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最后推导出其彪炳青史的剩余价值理论。^②

尽管因为提出所谓“最后一小时”理论而遭到马克思的严厉批评,但西尼尔在方法论上却是演绎推理的拥趸。他明确给出了政治经济学四大演绎推理前提:每个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牺牲取得更多的财富(经济利益最大化原理);人口增长速度快于生活资料增长速度(稀缺性假定);劳动者借助于机器能够生产出超过自身需要的产品(剩余产品法则);农业生产中的边际收益递减法则。^③

在坚持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同时,米塞斯在构建理论时又极力强调演绎推理。他说,历史和自然科学处理的都是过去经验,事实上也没有将来经验。由于人类行为学要处理的是一群复杂现象的经验,而且它又不可能做到使其他一切保持不变,即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只观察一个因素的变动,因此人类没有办法建立起一套关于人的行为和社会事实的归纳理论。也正是由于这两点,行为学的知识是纯形式的、一般的,而不涉及实际内容和个别情况。它所要求的知识是在其情况完全符合它的假设和推理的所有场合都可适用的。它的一些命题不是来自经验。它们像逻辑和数学的命题一样,是演绎的。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国学派的方法论前提有:个人行为是有目的的;人们的趣味和能力是不同的;所有行为的发生都有一个时间过程;人们是从经验中获取知识的。如果你承认前提,就不容你否认结论,这就是演绎推理的力量。^④ 它们的追随者更是大张旗鼓地宣称:经济学不是归纳科学而是演绎科学。经济学不是由经验加以证实的物理学,而是由逻辑加以证实的几何学;经济学不是关于事实的知识,而是关于逻辑必需的知识;经济法则之所以真实,不是因为它们与经验不相互矛盾,而是因为它们不能不真实。因此,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是一系列解释经济事件的法则。^⑤

演绎推理似乎避免了归纳推理的一些缺陷。但问题在于,演绎推理赖以存在的基础与归

① A. F. 查尔默斯(1976):《科学究竟是什么?》,查汝强、江枫、邱仁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卡尔·波普尔(1945):“历史有意义吗?”,载于《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郑一明、李惠斌、陆俊、黄书进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W. 海森伯(1981):《物理学和哲学》,范岱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查尔默斯以黑天鹅的出现为典型事例,把批判的火力对准归纳推理,得出了和波普尔完全一致的结论,即归纳推理在逻辑上存在漏洞。海森伯的怀疑来自人们观察到的“事实”真实性,以其名字命名的“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阐明的便是这一思想。另外,谢拉·C. 道在其《经济学方法论》第六章特别提到归纳推理在经济学中遇到的问题,如弗里德曼等在《美国货币史》中的结论并不适用于紧缩政策的后果。古德哈特在《中央银行和不确定性》(1999)中讨论了金融部门的货币-资产组合创新问题,指出当政策实施改变了归纳得出的事物间原有关系时,预测便会出现偏差。

② 马克思(1867):《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商品”),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在此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不仅娴熟地使用了演绎推理,而且在《资本论》第一卷也非常恰当地运用了归纳推理。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再版《跋》中所说,其方法论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③ 西尼尔(1836):《政治经济学大纲》,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④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1949):《人的行动》,余晖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1933):《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梁小民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⑤ Fuerle, R. D. (1986). *The pure logic of choice*, chapter one. New York: Vantage Press.

纳推理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从相当意义上讲,演绎的前提条件实际上都是归纳或观察的结果。比如,新制度经济学最重要的概念“交易成本”,并非其提炼和推广者罗纳德·科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现实中确实存在,只不过传统和正统经济学遗漏掉了而已。从交易成本不为零或大于零出发,科斯又运用演绎推理,原创性地讨论了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①

与归纳和演绎推理相并立的叫作溯因推理(abduction)。此种推理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皮尔士首创,在某种意义上突破了“归纳—演绎”的二分法,将推理拓展为归纳—演绎—溯因“三元”。溯因推理的基本特征是从结果倒推出可能的原因,构成科学乃至人类知识成长的一般模式。^②具体讲,溯因推理是指结合已知公理、假说,在对观察到的、通常是重大的或令人惊奇的现象进行解释时,提出理论性命题的方法。和归纳与演绎相比,虽然溯因推理不那么广为人知,但至少在经济学研究过程中它却经常被用到。像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过或正在产生深远影响的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中国改革开放等事件或进程,它们为什么发生?为什么沿着特定路径演化?抑或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和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革命之间有何相似之处或同构性?^③我个人的研究相当部分使用的便是溯因推理。^④

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方法论集体主义

理解复杂系统有不同视角,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集体主义^⑤当属至少必居其一的视角。概言之,方法论个人主义之要义在于:最恰当或最有效的社会科学认识来自对个体现象或过程的研究。^⑥以观察分析个人为出发点的具体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只有个人才有目标和利益;其次,社会系统及其变迁产生于个人的行为;最后,所有大规模的社会学现象最终都应该根据考虑个人的气质、信念、资源以及相互关系的理论加以解释。^⑦

最明确且最执着地笃信和鼓吹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经济学家,首推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依据他的说法,人生来就是个社会动物,而社会过程是发生于人与人之间的;个人行动的变动不居,就是这个过程的进展;除掉了个人,也就没有这样的过程,除掉了个人行动,也就没有任何社会基础;各种分工下的社会合作,只有在某些个人的行动中才能看得出来;集体是无法被具体化的;集体被认识,总是由于那些行动的个人赋予它以意义。^⑧这里需要补充说

① 罗纳德·哈里·科斯(2009):“企业的性质”(1937)和“社会成本问题”(1960),载于《企业、市场与法律》,盛洪、陈郁译校。上海:格致出版社。

② Charles, S. P. (1867). On the natural classification of arguments, in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Vol. 7. 亦参见钱捷(2003):“溯因推理:笛卡尔、康德和皮尔士”,《哲学研究》,第10期。

③ 西达·斯考切波(1979):《国家与社会革命》,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④ 张宇燕、高程(2004):《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北京:中信出版社;张宇燕、高程(2005):“海外白银、初始制度条件与东方世界的停滞:关于晚明中国何以‘错过’经济起飞历史机遇的猜想”,《经济学(季刊)》,第4卷第2期。

⑤ 一般认为,熊彼特在1908年出版的《理论经济学的本质与内容》一书中首次使用了“方法论个人主义”这一术语,但真正为方法论个人主义建立起一套完整推演体系的还是米塞斯的《人的行动》。“方法论集体主义”通常被认为是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另译为涂尔干)在1895年出版的《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中提出的。

⑥ 悉尼·温特劳布编(1972):《当代经济思想》,卢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

⑦ 马尔科姆·卢瑟福(1994):《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陈建波、郁仲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⑧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1949):《人的行动》,余晖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



明一点,米塞斯所说的“行动”(action),强调人之选择的目性,和潜移默化的习惯性“行为”(behavior)有着本质性差异。

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另一旗手布坎南坚定地认为,只有个人才是决策和行动的唯一主体,不存在脱离个体的、能够独立做出选择的“社会”或“集体”。他进一步指出,将“社会”或“集体”作为分析单位,是一种典型的逻辑跳跃,也就是从个体面临的稀缺性和不确定性问题,不恰当地延伸至“社会”层面的资源配置,从而忽略了个体偏好差异和基于自愿交换行为的互动复杂性,并最终导致理论脱离实际。

作为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对立面,方法论集体主义推崇的理念,至少在卢瑟福看来,首先是社会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其次是认为社会整体显著地影响和制约组成社会整体的各部分的行为和功能,最后是强调个人的行为源于社会系统(法律、目的或力量演绎),源于个人在整体当中的地位。^① 卢瑟福此番表述来自对美国旧制度主义学派(代表人物为凡勃伦和康芒斯)方法论的总结,其“硬核”体现为认定社会不是个体的简单加总,社会整体规定了个体属性和生存发展空间,社会结构或制度变迁决定了个体行为与选择空间,而非相反。

秉持方法论集体主义的最重要的思想家还是马克思,其标志性范畴为阶级分析。他和恩格斯共同写道:“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我们的时代,……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至今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② 需要补充的是,强调阶级或阶级分析的不仅仅是马克思等经典作家,被马克思多次提及或引用的托克维尔也可被归入方法论集体主义群体。托克维尔明确表示:人们会拿单个人的例子来反驳我;我谈的是阶级,唯有阶级才能占据历史。^③ 谈论阶级势必涉及阶级利益,于此便引出了方法论集体主义的一个主要理念,即承认存在超越个人利益的集体利益。

社会学家涂尔干(又译为迪尔凯姆、杜尔凯姆、杜尔干)既是“方法论集体主义”这一术语的首创者,也是具有代表性的践行者。作为实证社会学的奠基人,他明确反对以个体心理为社会学起点,主张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为那些独立于个体而存在,并约束个体行为的“社会事实”。涂尔干坚信,社会是一个具有自身结构和功能的整体,那些将社会分解为孤立的个体或部分的研究终将使人步入歧途。^④

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方法论集体主义,有针锋相对、势同水火的一面,也有相互补充的一面。有一段话很恰当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我们的研究对象不是一些简单的个体,而是一些在社会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社会个体……为了了解这种个体,我们必须把它放在其群体环境中来加以研究;而为了了解这种群体,我们又必须考察那些个体,因为正是这些个体之间相互关联的行为组成了社会群体”。^⑤

① 马尔科姆·卢瑟福(1994):《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陈建波、郁仲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1848):《共产党宣言》,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③ 托克维尔(1856):《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58页。托克维尔补充说:“谁能否认在当时也有很多富庶的所有者无时无刻不计利害地关心着农民的福利?但是这样做的人恰好与他们新的社会地位的规律相抵触,不管它们愿意与否,这条规律促使他们对农民漠不关心,同样也促使他们从前的附庸心怀仇恨”。

④ 埃米尔·迪尔凯姆(1895):《社会学方法的规则》,胡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在后来出版的《自杀论》中,他进一步阐述了社会对个体心理的决定性影响。

⑤ G. M. 霍奇逊(1988):《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向以斌等译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1页。

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

对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区分至少可以追溯到大卫·休谟。在他看来,人们不能从“是”推断出“应该”这一命题,即纯事实的描述性说明凭其自身的力量只能引起或包含其他事实的描述性说明,而绝不是做什么事情的标准、道德准则或规定。休谟的这个观点后来被命名为“休谟铡刀”。^①这把“铡刀”彰显出事实领域和评价领域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区别。西尼尔则从经济学家职责的角度解释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差别。他在《政治经济学大纲》中写道,经济学家“所从事的是科学,……因此,他就像个陪审员一样,必须如实地根据证据发表意见”“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家的职责,既不是有所推荐,也不是有所告诫,而是只说明不容忽视的一般原理”。^②

休谟和西尼尔只是指出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间存在本质的差别,而对实证和规范研究做出细致分析的当推其同胞约翰·内维尔·凯恩斯。后者指出,实证科学可以被定义为关于事物本相(what is)的系统化的知识门类;规范科学则可以被定义为关于判别事物是否具有可取性(what ought to be)之标准的系统化知识门类,即它关注人的理想,而与实际状况无关。^③另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布劳格对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进行了全面深入讨论,指出实证经济学力求驱除一切价值判断,仅研究经济本身的内在规律,并依据这些规律来分析和预测经济行为后果,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而规范经济学则根据特定价值判断提出某些分析和处理解决问题的标准,并以此作为经济理论前提,或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回答“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他特别强调这种区别尽管存在争议,但其意义也是有的,主要体现在对所研究问题的选择,阐释问题方式的确定,检验假说工具的使用,对某种行为及其后果是否欢迎的明确表露,等等。^④

最公开和坚定地主张将社会科学研究中主观价值影响祛除者,还要属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在一定程度上韦伯接受了康德的分类,并将经验知识和价值判断严格加以区分,且全力倡导社会科学研究要努力做到客观公正,“价值中立”,让事实归事实,让价值归价值。^⑤在经济学家中,弗里德曼可谓实证经济学的典型代表。在他看来,所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整体而言都在实证分析一边。而实证科学的最终目的是要发展出一种“理

① 休谟的这段表述转引自马克·布劳格的《经济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35页)。实际上这段话是从休谟的相关论述中概括出来的。其原文表述是:“在我所遇到的每一个道德学体系中,作者在一个时期中是照平常的推理方式进行的,确定了上帝的存在,或是对人事作了一番议论;可是突然之间,我却大吃一惊地发现,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是’与‘不是’等联系词,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的。这个变化虽是不知不觉地,却是有极其重大关系的。”参见休谟(1740):《人性论》,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05页。

② 西尼尔(1836):《政治经济学大纲》,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2页。

③ 约翰·内维尔·凯恩斯(1891):《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党国英、刘惠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经济学家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是更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父亲。

④ 马克·布劳格(1985):《经济学方法论》(第五章),石士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⑤ 马克思·韦伯关于“价值中立”的论述主要出自“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1904)、“科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1917)两文,收录于马克思·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另一篇相关文章“以学术为业”(1917)收录于马克思·韦伯(1998):《学术与政治》,钱永祥译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版。在我看来,韦伯是一位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其学术生涯中迟早会遇见并无法绕过的学者,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5)、《经济与社会》(1922)和《经济通史》(1923),都值得认真阅读。



论”或假说,“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做出合理的、有意义的预测”“理论应该根据它对其希望‘解释’的一系列现象的预测能力来进行检验”。^①据说他还讲过下面这句话:只有两种经济学,即“好的”经济学和“坏的”经济学;判定标准在于所做预测是否准确。

话说至此,必须提及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具体而言,对实证研究的质疑至少有如下四点:其一是经济学考察的不全是可量化的对象(比如如何度量效用);其二是可度量变量(如通胀和货币发行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能完全度量;其三是事实的独立性一直受到困扰;其四是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不是也不可能是研究客观世界或对象是给定的物理学。^②

举例来说,历史学家柯文就强调了事实与历史学家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他看来,选择什么事实,赋予这些事实以什么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历史学家提出的是什么问题 and 进行研究的前提假设是什么,而这些问题与假设则又反映了在某一特定时期我们心中最关切的事物是什么。随着时代的演变,人们关切的事物会不同,反映这些关切的问题和前提假设也随之发生变化。因此,人们常说,每一世代的史家都得把前一代史家所写的历史重写一遍。^③柯文多年后又特别补充说,事实当然存在,但事实无穷无尽,有时毫无用处,有用时也相互矛盾,宛如梦呓,令人费解。历史学家的职责是走到混乱的事实巴别塔深处,选择重要的事实,理解它们的意义。这个工作并不简单,虽然历史学制定了证据规则,而这些规则要求历史学家诚实,但任何历史研究难免有大量主观成分。选择什么事实,如何诠释其意义,取决于我们问什么问题,用什么理论操作框架。这些问题是什么,理论是什么,同样取决于我们心头所思。时间推移,心头所思移变,随之问题与理论也就发生变化。^④

除了像弗里德曼那样坚持实证经济学的学者外,也有学者不遗余力地肯定规范分析,比如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在他看来,价值赋予永远与我们同在,不带任何偏向的研究从来没有过,也不可能。人们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人们解决问题的途径,决定了概念的意义、模型选择以及对观察的挑选,等等。^⑤在相当意义上,价值观的另一种说法叫作“立场”,意指在感情上或道义上站在谁的一边。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方法论上遵循的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但同时其立场可谓旗帜鲜明,被恩格斯称之为“工人阶级的圣经”。^⑥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著述亦明显受到了价值观的指引。他以收入分配为主攻方向,指出资本主义核心矛盾表现为私人资本收益率快于产出增长率,显示出最富有者不是因为劳动创造了财富,只是因为他们的本来就富有,其结果为企业家不可避免地变为食利者,愈发强势地支配

① 米尔顿·弗里德曼(1953):“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中译文见《弗里德曼文萃》(上册),胡雪峰、武艺宁译。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两句引文分别见第123、125页。

② 谢拉·C·道(2001):《经济学方法论》,杨培雷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 柯文(1984):《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前言),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④ 柯文(2019):《走过两遍的路:我研究中国历史的旅程》,刘楠楠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47页。

⑤ 冈纳·缪尔达尔(1973):《反潮流:经济学批判论文集》,陈羽纶、许约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缪尔达尔的另外一个译名为“缪尔达尔”。

⑥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价值观念体系与意识形态是等价的。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可谓入木三分。他写道:“资产者的假仁假义的虚伪的意识形态用歪曲的形式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冒充为普遍利益”;“事情是这样的,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统治阶级,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5、54页。

那些除劳动能力外一无所有的人。而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就在于理性、系统地研究在经济和社会组织中国家的理想形态，并通过公共政策和制度接近理想社会。^①

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是否泾渭分明，至少在道德哲学家 R. M. 黑尔看来并非如此。偏好功利主义道德原则的黑尔将道德哲学浓缩为“是”与“应该”之间的关系，认为完整的道德哲学，必须包括对道德概念的逻辑特性以及在日常生活中道德原则带来的实际后果的考量。当人们说“不应该偷窃”时，这一规范性陈述的背后实际上有着一系列“实证性”条件，即如果你偷窃时被抓获，那么将面临审判并锒铛入狱。^② 在此，实证与规范的界限模糊了。

构成科学研究框架的“七要素”

人们在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他们所处世界的时候，建立起了五花八门的学说或学科。表面上看它们大相径庭，但实际上它们又都有着类似的研究结构。至少在斯奇曼斯基眼中，任何一门学科大致都有七个要素构成，即基本假定、概念、特定理论、现象范围、问题、检验方法和价值观念。^③

任何社会科学分支都有自己的基本假定，这样讲并不过分。所谓基本假定，作为整个分析架构赖以存在的地基，指的是在构建理论、模型或进行推理时被预先设定为真实且无需证明的基础性前提或条件。在数学中，基本假定等价于公理，比如两点间直线最短。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必须满足四个要求：前提必须是真的；前提必须是无法证明的（每一门学科内必定有一些原理不能从更基本的原理中演绎出来。为了避免解释中的无穷倒推，一门学科内存在一些无法证明的原理是必要的）；前提必须比结论更为人所知；前提必须是在结论中所作归属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因果关系。^④

在经济学中，“经济人”是一个最重要、最典型的基本假定，虽然不同的经济学家对其有不同的理解。概言之，“经济人”是指时刻在进行理性计算并以此为基础努力最大化自身收益或利益的所有个人。此假定遭遇的质疑首先来自人能否进行理性计算。经济学家兼心理学家卡尼曼在大量试验的基础上得出结论：“风险得以表述的确切方式，对人们的感知和行

① 托马斯·皮凯蒂（2013）：《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陈剑、余江、周大昕、李清彬、汤铎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右派经济学家的见解与之针锋相对。在他们看来，人们如何挣到钱这一点十分重要。在相对自由的社会里，多数高收入者获得财富的办法还是努力打拼这一老套路。如果“对自由的信仰”不是那么坚定，对富人的怨恨就很容易使人得出应该让政府夺走他们财产的结论。对那些没有获得哈佛大学教职者的抱怨，他们的回应是：那是你自己选择不去哈佛的，因为你未在在读博期间一天工作12小时每周六天半，未在顶级刊物发3篇论文；如果要获得终身教职，你还需如此5-10年。参见戴维·亨德森（2006）：《欢乐的经济学》，王志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② 布莱恩·麦基编（1978）：《思想家》（第八篇“道德哲学：对话 R. M. 黑尔”），吴芸菲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版。维特根斯坦的相关点评振聋发聩：“关于伦理学中的严肃问题要由那个即将做出可怕的重要决定的人来发问：我要做什么？”其另一句话意味深长：“一个人越想变得客观，他就会越发留意渗入其中的变化着的动机”。参见鲍斯玛（1986）：《维特根斯坦谈话录1949-1951》，刘云卿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7年版，第79、100页。

③ Szymanski, A. (1979). *Sociology: Class, consciousness, and contradictions*. Princeton: Van Nostrand. Szymanski 在讨论社会学的几种模式时给出了构成模式的七大要素。尽管他们最初是针对社会学模式的，但在我看来，这七大要素具有一般性，对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等都具有较强的适用性。该文的中译文见《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1年第4期，第41-46页。

④ 约翰·洛西（1980）：《科学哲学历史导论》，邱仁宗、金哲伦、林夏水等译。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

为能够产生显著影响”。^①换言之，表述方式影响人类反应，或形式常常重于内容。其次，质疑还来自人类通常选择的不是最优结果而是令人满意的结果，因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②再次是最大化自身利益的“经济人”，该如何面对有利他主义行为的人。当然，对上述质疑所做的辩护同样是有理有据的，比如奥曼认为，在特定场合个人的行动可能不是理性的；个人是会犯错误的，但是人又会在犯错过程中不断学习、积累经验、熟悉并最终适应环境，进而作为整体去接近理性，并由于数量、时间和学习等方面的累积效应，人作为整体却做出了理性决策。生物学家道金斯则通过把基因细分为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比较了“横向”或相互学习的文化基因和自私且纵向遗传的生物基因的遗传或传播方式，进而解释了助人为乐等利他主义行为实乃文化基因所致。^③尽管议论纷纷，但把众生假定为“理性经济人”，相对而言还是更为“经济的”，而且大多数经济学家接受这一“约定”。^④

具体到国际问题研究，围绕国家这一主要行为体，我们大致可以形成七个基本假定：一是国家行为体的目标为国家利益最大化（国家可以被人格化）；二是国家行为体是有限理性的（信息不完全或不对称）；三是国家间冲突利益与共同利益并存（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四是不存在世界政府（权力多中心）；五是权力在各行为体之间非均匀分布（国家有大有小）；六是全球问题普遍存在且治理赤字长存；七是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互动且博弈之交易成本大于零。除了基本假定之外，在分析具体问题时还可以根据需要设定一些工作假定，常见的例子之一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这里特别需要强调一点，即对假设的选择不能过于功利。西蒙警告说，在我们通过分解来构建子系统和机制并进而理解复杂系统运行情况的时候，便产生了因果概念，而要得到正确的因果推断，就不能任意选取或者为统计上的便利而选取假设；所谓的“伪相关”指的就是那些没有因果机制的变量间关系，亦即它们是从并不对应于独立机制的方程中估算出来的。^⑤

① 丹尼尔·卡尼曼（1982）：“事实对恐惧：理解可觉知的风险”，载于丹尼尔·卡尼曼、保罗·斯洛维奇、阿莫斯·特沃斯基编（2008）：《不确定状况下的判断：启发式和偏差》，方文、吴新利、张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24页。他进一步指出：“人们的判断倾向于停留在最初展示给我们的信息上，或提问时的措辞对被试表现出来的风险感知具有强烈影响”。见同书第528页。在《思考，快与慢》（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中，卡尼曼等分析了主宰人类思维的两个体系：其一，无意识的、凭直觉在顷刻间做出判断，这种判断基于情感、记忆和长期经验；其二，有意识的、不断地检查事实并精心盘算，同时非常懒惰，常常听从直觉判断；两者间互动构成思维工作体系，但前者并非总是理性。

② 赫伯特·西蒙（1947）：《管理行为》，詹正茂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赫伯特·西蒙（1960）：《管理决策新科学》，李柱流、汤俊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在上述两部著作中，西蒙均讨论了“有限理性”与“满意解”。当人们打算缝衣服时通常不去在数以百万计的针中挑选出最尖的那根针，而是选一根能缝衣服的针即可。

③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姆·巴耐特编（2006）：《经济学家之经济学家》（第15章“对话罗伯特·奥曼”），曹和平、雷震、叶静怡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R. 道金斯（1976）：《自私的基因》，卢允中、张岱云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④ 法国哲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亨利·彭加勒（又译庞加莱）认为，科学中的基本原理，诸如公理或定律，并非对客观实在的绝对真实反映，而是科学家为构建理论体系、更方便地解释自然现象而主动选择的“约定”，同时“约定”不是任意的，而是受到经验引导的。索洛指出，“经济人”不是一个心理学概念上的人，而是一个社会学概念上的人；经济人是一个站得住脚的概念，说它站得住脚，不是因为任何人生来就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而是因为社会规范鼓励这种行为；人本性是否是“经济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他（她）不按经济人行为逻辑行事，便会在社会中被边缘化或被淘汰。索洛的上述评论引自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编（1990）：《经济学与社会学》（第15章“罗伯特·M. 索洛”），安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⑤ 赫伯特·西蒙（2002）：《西蒙选集》，黄涛译。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1-365页。他补充说，所谓“伪相关”是指没有因果力量的变量间关系，它是从并不对应于独立机制的方程中估算出来的。

搭建任何理论大厦都少不了发挥砖瓦功能的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科学说到底属于一门关于概念或定义以及借助概念进行推理的学问,其内部的许多争论或所谓悖论,大多与概念的定义相关。^①一般而言,概念是对形形色色社会现实加以定义的基本单位,是对具有共同属性之事物的概括,有时也是理论的浓缩。对社会科学而言,有一些属于所有学科或分支都或多或少使用到的基础概念,而多数概念则分属特定学科,属于特有概念。关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概念,值得提及并做些摘录的是经济学家蒙蒂亚斯所做的工作,即给那些被普遍使用、歧义不多和价值判断较少的概念下定义。比如个人,客观对象,观察期,初始环境,当前环境,期末环境,行动,结果,讯息,信息集,选择,或然决策,偏好,主观概率,效用函数,预期效用,风险厌恶,命令,规则,政策,意图,互动,对等,生产,活动,技术,组织,成员,互动链,参与者,统治组织,政治实体,国民,宪法,系统结构,体制结构,等等。^②实事求是地讲,本概念清单远非十全十美,尚有补充完善的空间。但在一定程度上,它可以说为特定学科的概念体系建立奠定了基础,属于概念体系的基础设施。

具体到国际问题研究,我们已经拥有了一系列自身特色鲜明的主题概念和独有概念。比如民族国家,国家利益,国家主权,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国际组织,国家行为体特性,利益攸关度,全球利益,全球问题,全球治理,治理绩效,治理成本与收益,全球公共产品,国际集体行动难题,国际规则(制度)中性与非中性,国际博弈均衡,世界秩序,合纵连横,孔子改进与孔子效率,无意安全与有意安全,“一带一路”,百年变局,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③毋庸置疑,构建新时代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话语体系,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七要素”中的第三个要素是特定理论,即对某一领域现象的系统性解释与预测,它由一系列假定、概念和原理构成,并基于观察、实验和逻辑推理。说得通俗一些,理论不外乎是多个已概念化变量之间的稳定关系,在社会科学中通常表现为模型与定理。理论模型或建模,其价值被莫罗归纳为以下十点:一是模型迫使论述变得精确;二是让我们看到结论如何从假定推导而来;三是让人抓住社会情形的本质和主要变量;四是揭示出文字表达过程中隐含的假定;五是得出新的论述思路命题或与初始直觉相异的结论;六是清除那些不是来自假定推导的(经常是相互矛盾的)支持性论述;七是规范有时不可靠的直觉;八是创造逻辑结构,即围绕一般化模型而积累起一系列模型;九是使丰富细致的复杂世界得以简化;十是方便对结论或命题进行检验。^④

建模的意义经济学家更有体会。萨金特指出,历史数据经常是充满错误和不完全的。你阅读当代人的研究,他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发表不同意见,阅读历史学家的观点,他们用自己的纺车来缠历史的线。我们经常看见相互竞争的各种理论在解释一些历史片段。但是,如

①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专门有“异常和悖论”条目。在谈及经济学悖论分类时,第一个便是“修辞性悖论”,即其产生原因为术语模糊性或缺乏阐述前提。参见该书第五卷第854页。

② Montias, J. M. (1976). *The structure of economic systems*, chapter on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鉴于其学术意义,我把上述概念的定义全部翻译出来,并作为注释的一部分陈列于此。但考虑到全部文字有1300多个,我最终还是忍痛割爱了。感兴趣的读者可去查阅英文版原著。

③ 这个清单中有些概念是我们在分析中提出或加以拓展的概念,比如“国际制度中性”和“国际制度非中性”,就来自张宇燕(1992):《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无意安全”和“有意安全”来自张宇燕、冯维江(2021):“新时代国家安全学论纲”,《中国社会科学》,第7期。

④ 詹姆斯·D·莫罗(1994):《政治学博弈论》,吴澄秋、周亦奇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4年版,第7-8页。



果不抛掉历史细节,就不会有一个连贯一致的、像你们正规模型中所做的那种分析。用我们在正规模型中的方法去分析这类转换,要求一个建立在经验上的、说明社会过程的可操作模型,从而引导出新模型、进行范式转换以及概念创新。^①

万事有利便有弊。至少在缪尔达尔看来,使用模型分析方法面临如下风险:一是可能忽略、至少是轻视时间或历史,进而不去关注导致人们选择次劣制度的具体原因;二是使用为不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而建立的高度简单化的普遍性模型,但后者毫无预测价值;三是隐含地但却是坚定地认定所有国家都可以也应该实现繁荣,从而忘记了共同繁荣只能是理想。^② 尽管对模型分析的批评还有很多,但我们必须也只能在约束条件下求最优。

现象范围,指的就是学科边界。前文提及康德对知识的分类,可谓在高维上对学科边界划定提供了原则指引。一般而言,划分学科边界的要素通常有四个:一是核心研究对象与问题领域,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划分主要依据即在于此;二是独特的研究方法,当然不排除各学科之间方法上的相互借鉴;三是由特定领域学者共同构建的相对封闭的学术共同体;四是表现为大学院系设置、学术期刊分类和科研基金申报等制度安排。

说到此,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物种分类。依据形态学、生理学、生物化学、遗传学和生态学等特征,动物与植物被分成了两“界”。随后人们便可按照“门,纲,目,科,属,种”,分别对动物和植物进一步分层分级界定。社会科学分类在一定意义上完全可以照搬这套方法。分类精准明确,不同层级的学科边界也就随之被划定了。

广义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由个人组成的复杂系统。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显然各有其研究的侧重点和研究方法,并且可以不断“子”学科化。学科划分层级越低,所涉领域就越窄,专业化分工就越细密,钻研也就越深入,理论或定理功效越高,排他性亦越强。^③

上述分类与界定研究边界的思路,对交叉学科则基本不适用。举例来说,国际问题研究或区域国别研究涉及的领域几乎涵盖了所有社会科学分支,因而它们缺乏相对统一的研究方法。除了总体上都关注国家间关系以及对象国内部事务外,它们的研究对象还具有极强的发散性,这种发散性既体现在学科上,也体现在地理空间上,^④ 还体现在议题上。我在前面提炼了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内带有一般性的几个议题,而后的共同点表现为综合性强,即做出解释或给予回答需要牵扯多个学科联合攻关。如此看来,国际问题研究的边界不能也不

① 托马斯·萨金特的论述引自保罗·萨缪尔森、威廉姆·巴耐特主编(2006):《经济学家之经济学家》(第14章“托马斯·萨金特访谈录”),曹和平、雷震、叶静怡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6-307页。

② 冈纳·缪尔达尔(1970):《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顾朝阳、张海红、高晓宇、叶立新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352-353页。

③ 这很容易让人想到著名的“哥德尔定理”,其最通俗的表述是:任何足够复杂的数学系统,要么存在无法证明的真理(incomplete),要么存在自相矛盾之处(inconsistent),二者必居其一。数理逻辑学家王浩所著《哥德尔》一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详细介绍了他的良师益友哥德尔的生平与贡献。

④ 和区域国别学最为接近的学科恐怕要算地理学了。关于地理学的性质、范围与目的,有如下大同小异的见解,比如,认为地理学是在通过对不同现实领域及其多种表现形式的存在及其相互关联性的理解,来认识区域和地方的特性,并且在大陆、大小区域以及地方的实际排列中,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地球表面。又比如,认为地理学是地方的科学,它研究各国的性质及其潜力,而一个国家的特点,取决于它的要素的总和,及与地方差异性相联系的社会多样性。再比如,1950年英国地理工作者的语汇委员会提出了地理学的定义是:特别强调地区的差异性和关联性,来描述地球表面的科学。美国大学词典的定义是:通过气候、地形、土壤、植被、人口、土地利用、工业,或国家等因子以及由这些因子所错综组成的地区单位的特点、排列和相互关联,来进行地球表面的地区差异性的研究。转引自R.哈特向(1959):《地理学性质的透视》,黎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4-15页。

必要用学科来划定,而是应代之以问题来划定。从这个意义上讲,区域国别研究的真正挑战不在于能否吸引、聚拢、培养出复合型人才或通才,而在于:首先,能否吸引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优秀专业人才聚焦于或参与特定国家与地区的特定领域或特定议题的研究;其次,能否培养、发现和任用具有开阔视野、高远眼光的领军型专家学者,先是将综合性议题进行科学分解,然后挑选各学科的“能工巧匠”,针对各个层级的被分解议题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最后是对分散的研究成果加以整合并形成综合“解”。

所谓问题,则是建立在某种假定之上的、以特定概念为构件的特定理论所提出的在某一现象范围内尚未得到适当解释的现象或疑惑。问题也可以被视为个体或群体在现实状态与理想状态之间存在的差距、矛盾或未知。正如每一个特定学科都有属于自己的专有概念,每一个学科也都有自己的关键问题。经济学的主导问题非斯密那本名著名称莫属: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即经济长期增长。用中文讲就是司马迁所说的“货殖”。^①对科学研究而言,观察到问题或提出问题是科学进步的关键环节。奥尔森特别指出,研究的质量依赖于问题的重要性和分析路径;一定要努力寻找一个既有意思又重要的问题,而不要在意它该归类于哪个领域;努力解决问题,目标实现的最佳角度是你能够获得最大进展的角度,不要去管用什么假设或哪一学科的知识。^②鉴于世间有趣的和值得投入时间精力的问题随处可见,而人生短暂,故一定要去关注那些带有根本性的、一旦想起就心旌激荡的重大问题,首要的问题即为国家的兴衰或经济长期增长这等宏大问题。与此同时,那些能够以小见大的问题亦价值不菲,经济学家戴维对打字机 QWERTY 键盘(即以键盘左上角的六个字母命名的键盘)占据市场成为主流的历史进程研究便是一例。也正是这篇论文,把描述生物演化的“路径依赖”概念正式引入经济学并使之大放异彩。^③与之相比,科斯提出的问题更具一般性和深刻性:为什么会有企业?企业规模为什么就那么大?在回答这些问题过程中科斯引入的交易成本概念,催生了不止一个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分支,同时引申了众多重大命题并带来重大学术进展。^④无论在经济学还是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类似的故事层出不穷,随处可见。

① 即亚当·斯密 1776 年所著《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货殖”为司马迁所著《史记》中“列传”之一种,其中“货”指货物、商品或资本,“殖”指繁殖或增值。

② 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编(1990):《经济学与社会学》(第9章“曼库尔·奥尔森”),安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奥尔森补充说,取得科学进步的最好方法是关注原生态存在体的细节,其基本单元是个人;获取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和历史知识异常重要,只有那些不能把握所需对付的难题的经济学家才常常小看跨学科研究。33 年前我作为访问学者求教于奥尔森时,他极其强调研究要以问题为导向,尤其要选高质量的问题。他还用非洲原野上狮子捕食猎物来比喻选题:它们一旦发起攻击,首要目标一定是咬断猎物最致命的颈动脉。亦可参见曼库尔·奥尔森(1982):《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吕应中、陈槐庆、吴栋、孙礼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在后来的译著中,“曼库尔”被译为更接近发音的“曼瑟”。

③ David, P. (1985). 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5 (2), 332 - 337. 戴维指出,技术相互关联性、规模经济和投资不可逆性,是导致打字机市场最终锁定 QWERTY 键盘的关键因素。以路径依赖为基础,报酬递增以及制度演进的路径依赖等概念或理论,随之获得了迅猛发展。说到键盘的历史,我联想起历史学中近来发展势头强劲的微观史学。以卡洛·金斯堡的《奶酪与蛆虫:一个 16 世纪磨坊主的宇宙》、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和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1294 - 1324 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为代表,摒弃传统史学对帝王将相与重大事件的关注,转而以普通人、小社区、地方性事件或特定文化事件为研究对象,于微见著,以小见大,揭示其背后的宏观社会结构、文化心态与历史演化。中国学者王笛亦以其《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和《袍哥:1940 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等著作,引领了中国微观史学的发展。

④ 罗纳德·哈里·科斯(1937):“论企业的性质”,载于《企业、市场与法律》,盛洪、陈郁译校。上海:格致出版社 2009 年版。



所提问题的难易程度同样会影响研究质量。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切尔等人为代表的美国旧制度经济学从昌盛走向衰落，原因之一可能就在于他们提的问题本身过于宏大综合和方法传统而难以回答。新制度经济学取得显著进展，不在于对传统经济学问题（资源有效配置）给出新的回答，而是提出了新问题并做出了回答：为什么经济制度以现在这样一种方式而不是其他方式出现或存在？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分支之一，计量经济史学的奠基人福格尔及其追随者提问的方式别具一格：如果没有贯通东西海岸的大铁路，美国经济会是什么样子？如果俄国没有爆发十月革命，那么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经济会达到何等规模？这批计量经济史学家借“反事实”提问并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解答，虽然不无争议但仍收获了可观成果。^①

关于问题，还有一个多角度的观察值得一提，即所谓“抗解问题”（wicked problem），指的是那些具有复杂性、矛盾性和动态变化特征的难题。它们，无明确定义，边界模糊，需通过解决过程才能逐步明晰；不可逆，每个解决方案都产生不可撤回的连锁反应；动态关联，解决方案会引发新的次级问题；价值冲突，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诉求难以调和。后来“抗解问题”又被进一步“升维”为“超级抗解问题”（super wicked problem），其核心特征包括：时间紧迫性，即问题具有不可逆转性，需立即采取行动；无政府状态，即缺乏中央权威机构或全球共识来制定解决方案；制造者悖论，即那些试图解决问题的人往往也是问题产生的源头；非理性决策，即政策制定常忽视未来影响，导致短期行为。^② 不言而喻，类似气候变化和地缘政治这类典型的“超级抗解问题”的出现或存在，为区域国别学和国家安全学等交叉学科的诞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七要素”中的最后两个要素，即检验和价值判断，我们在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一节已经讨论过了。这里要做的无非是一些补充性或强调性说明。一是用预测结果的准确度对理论或模型进行检验，是鉴定我们领悟力的绝佳途径。二是预测的准确度和预测本身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错误概率为50%的预测要大大好于不作任何预测，因为不作预测意味着完全在黑暗中做出决定。^③ 三是用形式逻辑“检验”文字推理同样必不可少。四是比较研究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关于这一点，李普曼的那句名言值得在此被引用：只懂一个国家的人实际上不懂任何一个国家。^④ 五是

① 我最早接触到“反事实假定”和“计量历史学”是1988年读了刊登在《国外社会科学》上罗伯特·福格尔所著《作为社会科学工具的数学模型》一书的摘译，后来又陆续读到他的一些论著，他本人也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史学界，这类问题一直像幽灵一样存在着，不断激发着人们的想象力。参见尼尔·弗格森（2000）：《未曾发生的历史》，丁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② “wicked problem”还被翻译成“棘手问题”或“奇特问题”。比较而言，1973年首次被提出的、最贴近原意的翻译还是“抗解问题”。参见Rittel, H., & Webber, M. M. (1973). Dilemmas in a general theory of planning. *Policy Sciences*, 4 (2), 155–169. 随着复杂系统变得更加复杂，39年后此概念被升级了。参见Levine, K., Cashore, B., Bernstein, S., & Auld, G. (2012). Overcoming the tragedy of super wicked problems: Constraining our future selves to ameliorate global climate change. *Policy Sciences*, 45 (2), 123–152.

③ 奥斯汀·罗宾逊：“我的经济学家实习期”，载于迈克尔·曾伯格编（1991）：《经济学大师的人生哲学》（第15章），侯玲、欧阳俊、王荣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阿罗在二战期间受雇于美国军方的气象部门。他和同事们在核对了大量的气象资料和曾经做过的天气预报后意识到，预报一个月以后的天气是徒劳的，无异于碰运气。于是他们就向上司反映，要求不再做类似的预测。他们得到的答复是：总司令完全清楚预测是不准确的，但是他需要这些预测供计划之用。参见肯尼斯·阿罗：“我之鉴赏力”，同上书，第2章。

④ Lipset, S. M. (1996).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 double-edged sword*.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p. 34. 他补充说：“在观察两国同类制度及其行为差异时，没有比较心灵就不知道如何前行。”历史学家戴蒙德也表达过同样的看法：如果历史学者仅研究一个国家的历史，最终无法理解任何国家的历史。换句话说，只研究一个国家微观史的历史学者无法意识到该国的特殊之处，也无法提出关于该国最重要的问题。参见“微观史风潮下的大历史写作——专访历史学者贾雷德·戴蒙德”，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3年第24期。顺带说一句，戴蒙德是《枪炮、病菌与钢铁》（1997年出版，谢延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的作者。

博弈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地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对区域国别研究更是如此。最后一点，“七要素”可被用来拆解和分析几乎所有理论，亦可作为书写者构思文章与书稿的基本依据。

治学守则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四度”

梁启超在总结清代学界正统派学者之学风时，写下了治学当信守的十条原则：一，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臆度者，在所必摈；二，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三，孤证不足定说；四，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为不德；五，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六，采用旧说，必明引之，抄说为大不德；七，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八，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九，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十，文体贵朴实简洁，最忌“言有枝叶”。^①从上述原则中，我们不难看到明末清初私人修史大家张岱的影子。张岱在以一己之力修撰明史过程中，“事必求真，语必务确，五易其稿，九正其讹，稍有未核，宁阙勿书”，其精神为清代史学家树立了榜样。^②

无独有偶，在梁启超开列出上述十条“治学原则”的一百多年后，我在访问美国知名智库兰德公司时，见到了挂在大厅醒目处的“高质量研究十条标准”：一，精确界定研究问题和研究目的；二，精心设计研究方法并严格遵循之；三，研究必须考虑其他相关研究成果；四，所运用的数据和信息必须易于获得；五，假设必须明确且经过论证；六，成果必须在对知识有所增进的同时与重大政策议题相关；七，政策建议应逻辑清晰、论证充分、解释完整；八，表述需准确、易于理解、结构合理、语气温和；九，研究需激发决策者或利益攸关者的兴趣且有实用价值；十，研究必须客观、独立和不偏不倚。虽说兰德公司的“十条标准”旨在推出更多高质量政策报告以求更好地服务美国内政外交，但就研究本身而言，与清代正统派学者的治学之道相通之处还是有的。

条条大路通罗马。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曾谈到，不同的物理学家喜爱物理学不同的方面：有些物理学家努力寻求的是最基础的普遍原理；有些物理学家只猎取新的现象；有些则喜爱测量的精确性；有些人则热爱改善仪器或技术。而成就卓著的物理学家也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发现全新的现象；二是对现行理论的证实与应用；三是材料和普通常数的精确测量。^③虽然费米关心的是物理学，但不难发现，经济学或国际问题研究与之有不少共同之处。^④

从反面看，布尔迪厄对法国“伪知识分子”的嘲讽，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

^① 梁启超（1921）：《清代学术概论》，参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朱维铮校注。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9页。此处对引文做了少量删节。

^② 张岱（2017）：《石匱书自序》，北京：故宫出版社。“石匱”是司马迁保存史料的地方，经历明朝灭亡这一巨大变故的张岱，以此命名自己的书，意在表达对司马迁的推崇，兼有借此书存贮故国记忆之意。除了《石匱书》外，张岱还是流传更广的《夜航船》《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等的作者。

^③ 埃米里奥·塞格雷（1987）：《原子舞者：费米传》，杨建邺、杨渭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26、74页。顺带说一句，塞格雷是费米的学生，于1959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④ 话说到此，我又想到了关于物理学与经济学的一段轶事。据说有一次凯恩斯和物理学家普朗克两个人共进晚餐，普朗克对凯恩斯说，他曾一度考虑要从事经济学研究，但后来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觉得经济学太难了。凯恩斯把普朗克的话作为趣闻告诉他的剑桥朋友，后者觉得诧异，并告诉凯恩斯，罗素也曾经想研究经济学，但是因为发现经济学太简单了而最后作罢。参见托德·M. 巴克霍尔兹（1989）：《已故西方经济学家思想的新解读》，杜丽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中至少是部分知识分子的另一副面孔：“这些人只保留了知识分子作用的外部表象，看得见的表象，宣言啦、游行啦、公开表态啦。其实这倒也无所谓，关键是他们不能抛弃旧式知识分子之所以高尚的基本特点，即批判精神。这种精神的基础在于对世俗的要求与诱惑表现出独立性，在于尊重文艺本身的价值。而这些人既无批判意识，也无专业才能和道德信念，却在现时的一切问题上表态，因此几乎总是与现存秩序合拍”。^①一言以蔽之，追求真理、专业技能、道德信念、谨言慎行，同样是人文社会科学从业者的“金科玉律”。

作为文章的结语，我打算就如何进行社科学术研究谈几点心得。为了方便理解与记忆，我将其归纳为做学问需要关注的“四度”，分别为精度、角度、维度、温度。

“精度”一词通常指准确性、精密性和正确性。将其运用于学问方法，则主要包含三层意思：其一，所用概念需定义精准；其二，建立在概念基础上的理论或模型尽可能简洁精当；其三，概念或理论与历史及现实的吻合度。在前文谈到概念的地方，我已经充分阐明了我的基本看法，即从某种程度上看，人文社会科学无非是关于概念或定义的学问。未经严格定义的概念大多不值得讨论。许多低效甚至无效的争论，十之八九是因为概念的模糊性。简洁精当，在此指的是用最少的文字或符号容纳尽可能多的信息。郑板桥与友人“论学”时写下的“删繁就简三秋树”楹联，表达的即是此等追求。至于理论与现实的吻合度，恰如我前面提及的马克思在《资本论》再版《跋》中所说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同时还包括依据特定理论或模型所做预测的准确性。虽说把预测准确度视为判定理论优劣唯一或绝对标准有失偏颇，但也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关于“精度”需要补充的是，做到绝对精确几乎不可能。维特根斯坦这位把哲学问题还原为语言问题的思想家，对严格定义现象或对象或概念抱有深深的怀疑。^②然而即便如此，尽力提高精度仍应成为一个目标。

“角度”一词主要有两种含义，其一为考虑或观察事物的出发点；其二为数学名词，特指角的大小的量，通常用度分秒或弧度表示。延展连绵的山脉，高耸孤立的山尖，被苏东坡描绘成“横看成岭侧成峰”。究竟是太阳升起还是地球转动？当年伽利略之问成为捍卫哥白尼“日心说”同时质疑“地心说”的强有力证据之一。^③何以如此，皆因诗人与科学家所处位置不同和观察世界思路独特。正是由于他们在看问题的角度和看待事物的出发点上另辟蹊径，我们后人才能欣赏优美奇妙的诗句和领略科学进步的艰辛过程。作为数学名词，“角度”在此可以做两个方向的引申：精深阅读与博闻强记，理论适用广度。关于这两点，我立刻想到的名字就是凯恩斯和达尔文。在列举优秀经济学家必须具备的条件时，凯恩斯以他的老师为例，称赞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受过多方面的训练，有着多重性格，是出众的历史学家和数

① 皮埃尔·布尔迪厄、汉斯·哈克（1994）：《自由交流》，桂裕芳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51页。

② 以维特根斯坦为师友的鲍斯玛回忆说，他曾希望维特根斯坦给“善”（good）下一个定义。后者想了一会儿说，设想某个民族有一个先知，他制定了法律，明确界定了“你不要……”。人们要么遵守这些法律，要么违背法律。没有人质疑法律的权威性。这时候如果有人问什么是“善”？他们会说：谨遵法律就是一个好人，违反法律就是一个坏人。后来崛起了一个革命党的先知，他制定了另外一套法律，并且有人追随。再往后先知一个一个地出现。在此过程中，所有法律的权威性都被动摇了。这时候就会有人感到迷惑和游移，会非常真诚地问什么是“善”？如果他追问“善”的定义，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是寻求指引？它又如何能够指引他？定义“善”，法院有自己的用法，物理学有物理学的用法。一个人能做的就是去描述“善”这个词的用法的某些特定方面……但是用法无限复杂。因此，“善”这个词被用于极端复杂的游戏，其中还有其他的棋子，比如“必须”、“良心”、“耻辱”、“罪责”、“坏”，等等。“善”的用法太复杂了，根本不可能定义。参见鲍斯玛（1986）：《维特根斯坦谈话录1949-1951》，刘云卿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7年版，第69-71页。此段话完美地展现了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表达的思想，即只有在上下文或叙述结构中方可能理解特定概念或词语的含义。

③ 伽利略（1632）：《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周煦良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学家，既精通特殊，又精通一般，既重视暂时的，又重视永恒。^①至于理论适用广度，我的脑海里立刻便浮现出前面提到过的达尔文，其进化论解释领域之广无出其右。

“维度”一般用于描述空间中物体位置和方向，代表确定对象点所需的最少坐标轴数量，如一维（直线）、三维（空间）和四维及以上（时空连续体等）；它也指事物“有联系”的抽象概念数量，如面积由长度和宽度两个维度构成；在哲学上，它指观察、思考与表述事物的不同思维角度或层次。具体到做学问，“维度”至少有两项相关内涵：一是“维”的数量，二是“维”的层次或等级。庄子所谈“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②皆因维度之差也。爱因斯坦曾多次强调直觉和想象力在科学创造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③原创性思想有时来自顿悟，也有时经历漫长的过程。^④而在我看来，所谓直觉和想象力或原创性，在很大程度上还与“换维”思考无异。^⑤经济增长理论的演化可作为维度发挥功效的典型事例。柯布一道格拉斯增长函数主要考虑劳动和资本这两个变量；后来索洛将全要素生产率引入模型；再后来国际分工与贸易新维度“量”加入；突破维度“量”进入维度“层”后，亦即把影响所有上述变量的“制度”作为高维要素引入后，不难想见，经济增长模型的解释与预测能力将随之提升。^⑥

“温度”是表示物体冷热程度的物理量，微观上讲是物体分子热运动的剧烈程度，只能通过物体随温度变化的某些特性来间接测量。在人文社科语境中谈论温度，自然看重的不是其物理性质而是它的引申含义：价值取向与家国情怀。人无不生活在社会中，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就是由形形色色甚至根深蒂固的价值取向或判断准绳编织而成的。孟子在“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话语中对天下、国、家、（修）身的排序，对世人提出了道德要求。再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

① 凯恩斯还提出了一些优秀经济学家的素质：他必须具有综合的天赋，必须在几个不同的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还必须身兼多种能力，这些能力又常常不可兼得。在某种程度上：他必须是数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他必须懂符号、善于辞令；他必须透过一般了解特殊，并在一闪念间触知抽象和具体；他必须根据过去、为了未来、研究现在；人类的天性或其社会结构，他都必须心领神会，不容有被漠视的地方；他必须办事果断，处事公平，两种心境缺一不可；他应当像艺术家，超然物外、廉正无私，有时又应该像政治家，体察民情。这种种理想的多面性，虽说不是全部，但有很多马歇尔是具备的。参见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33）：《艾尔弗雷德·马歇尔传》，滕茂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② 《庄子·秋水》，参见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

③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930）：《我的世界观》，方在庆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

④ 凯恩斯在1933年的一次讲课中说道：“创造性的思想在一开始是脑子里的灰色、模糊和头绪纷乱的怪物。在思想发展的后期，才能找到精确的语言来描述它。”参见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2003）：《凯恩斯传》，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533页。

⑤ 创造性直觉的杰出代表群体中，牛顿毋庸置疑占据着一个耀眼的位置。凯恩斯在讲到关于行星运动的最基本发现之一的情形时引用了牛顿与哈雷的对话。哈雷问道：“你是怎么知道的呢？你已经证明了吗？”牛顿非常吃惊：“什么？我已经知道多年了。证明，不论其价值如何，我已说过，是随后装扮起来的。它们不是发现的工具。如果你给我几天时间，我肯定会找到一个证明。”对此凯恩斯感慨道：“这个奇特的灵魂，他受到了魔鬼的诱惑，当他在这些围墙之内解决如此众多的问题时，相信自己利用纯粹的心智力量就能破解上帝与自然的所有秘密——集哥白尼与浮士德于一身。”参见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33）：“牛顿其人”，载于《传记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原创性思想有时来自顿悟，也有时经历漫长的过程。凯恩斯在1933年的一次讲课中说道：“创造性的思想在一开始是脑子里的灰色、模糊和头绪纷乱的怪物。在思想发展的后期，才能找到精确的语言来描述它。”参见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2003）：《凯恩斯传》，相蓝欣、储英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533页。

⑥ 这部分工作是我与夏广涛已有初步成果并将继续完善。参见张宇燕、夏广涛：“理解经济增长的源泉：基于一个简约的生产函数”，《国际贸易》，2024年第7期。



之幼”，以及“横渠四句”，均旨在以特定方式烘托并测量人文社科研究的“温度”。^①更进一步讲，温度还含有宽厚包容之意。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繁杂，方法迥异，业者多元，观点林立，这已经在本文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反映。如何对待极端对立之见解？怎样处理水火不容之观点？这时，秉持中国古代圣贤之“执端守中”的“中庸之道”，不失为明智之举。^②

不言而喻，做好学问仅凭注重“四度”还远远不够，但于我而言，它们完全可以作为学术研究方法宴席上的几道菜被端上桌台。顺便补充一句，郑板桥论学所写“论文”的下联为“领异标新二月花”。对真正的学者来说，除了将研究视为一种生活方式外，做“二月花”理应成为事业或职业追求的一个目标。

① 此处所引孟子的话，均出自《孟子》。冯友兰将张载的语录，“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称作“横渠四句”。“横渠”为张载别称，因其在陕西凤翔府横渠镇居住、讲学及终老，被后人尊称横渠先生。参见冯友兰（1942）：《新原人》，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

② 孔子讲：“去其两端，取其中而用之。”（《论语·雍也》）。孔子还讲：“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礼记·中庸》）。蔡元培所说：“不走任何一极端，而选取两端的长处，使互相调和”，可谓中庸之道的现代运用。参见《蔡元培全集》（第6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98页。